

---

## 徐正光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宗坤\*\*

陪訪：張秀蓉\*\*\*

紀錄：張宗坤、熊婉媛\*\*\*\*

時間：（一）2019年1月20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二時

（二）2019年4月13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二時

地點：中研院民族所會客室（台北南港）

徐正光先生，1943年出生於台灣屏東內埔，1961年就讀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為該系第二屆畢業生。1969年以教育部公費生身份赴美，就讀伊利諾大學，研究工業社會學。赴美期間，恰逢釣魚台運動高峰。返台後至中研院民族所任職，並從事社會變遷與勞工研究。1987年出任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執掌該所期間歷經五二〇農民運動、遠

---

\* 訪談者按：訪談者要特別感謝徐正光先生為本篇訪問紀錄書信往返、校正的耐心；也要特別感謝台大歷史系張秀蓉教授一同受訪，為徐老師的口訪添增不同視角的細節，讓本文得以更加生動詳實。訪談者也要感謝政大勞工所的熊婉媛同學協助進行第二次訪談逐字稿的整理，以及台大城鄉所的劉睿同學協助抄錄台大社會系前四屆的畢業生名單，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校正。

\*\*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所長（退休）

\*\*\*\*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化罷工、野百合運動、獨台會案、廢除刑法一百條等解嚴後重大社會運動。是次訪談請徐正光先生重返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期，回憶參與保釣運動的見聞、從事勞工研究的緣起，以及對解嚴後農運、工運、學運等社會運動的觀察。

## 一、在屏東求學的時光

我是 1943 年出生，我曾經開玩笑說，我有三年的時間做過日本人。我父親家中有七個兄弟姊妹，他是老大，只有他在屏東農業職業學校讀到畢業。<sup>1</sup> 父親可以讀到高職是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通常老大都要留下來種田。父親的日本老師覺得他是可以讀書的料子，所以就一再說服我的祖父，送我爸去讀書。1945 年台灣到處都被轟炸，台北、新竹、高雄、屏東，都被美軍炸得很厲害，我的阿婆 (a / poˊ) 也被炸死了。<sup>2</sup> 小時候，我家裡有很多的日本出版的小朋友看的書啊、漫畫啊，或者是用漫畫寫的日本歷史，但在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變後，很多書一下子不知道到

- 
- 1 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即今日之屏東科技大學。該校設立於 1924 年，初稱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1928 年因規模擴大，易名為屏東農業學校，性質為實業學校。1954 年由職業學校改制為專科學校，1991 年升格為台灣農業專科學校，1997 年再升格為科技大學。本文作者所稱「父親讀到高職」，應是指父親在戰前讀過戰後升格為高職的該校。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年代不明。〈校史簡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url=http://nportal.npust.edu.tw/files/11-1000-2374.php](http://nportal.npust.edu.tw/files/11-1000-2374.php))。檢閱時間：2022 年 1 月 2 日。
  - 2 訪談者按：本文所有客語拼音，係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常用詞辭典的「四縣音」條目。

哪裡去了，可能是我父親拿去丟掉了，或者是被收走了。

我們家裡水田大概有一甲多，靠近山邊的地方缺水灌溉，就種花生、蕃薯。後來經濟環境比較好，我們家族的這一支，累積到有三甲田左右。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家有兩、三隻牛，四、五隻羊，算是中等的農戶。70年代以前，農村的生活很苦，國民黨的農業政策都在控制這些農民，透過農會以肥料換穀的方式來收購農民收成的穀子。<sup>3</sup>我們的伙房（fo、fong<sup>ˇ</sup>）前面，收成季節都在曬穀子。曬穀子一定要看天氣，什麼時候天黑了，馬上就要把稻子收集起來，用布棚蓋著，或者是收到屋子裡面去，那穀子一定要曬到34、5度，然後用牛車運到農會去繳納。

我們住的村子叫做東片村，我讀的是隔壁東勢村的東勢國小。東勢村完全是個客家庄，那間學校也是客家人讀的。這個村子靠山邊的地方，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平埔族住的；再往山裡走，就是龍泉、愛寮、三地門這些村落，這些就是河洛人或是原住民住的。1955年我念屏東中學時，必須從三地門、內埔坐學生專車到屏東市區去讀書。在車上就是各種族群、不同學校的學生坐在一起。那個時候並沒有所謂的族群意識，只是覺得他跟我們有所差異、有所不同，就是發現怎麼這個人講台灣話、福佬話，或講山地話，我們都聽不懂。像住在山邊的平埔族人，他們種了水果，或者是在山上砍了一些樹，用牛車拖下來到村子裡面來賣。

---

3 肥料換穀（檔案中稱「肥料換谷」），係1948年起由省糧食局負責執行的農業政策，規定肥料不以現金購買，而必須用指定農作物之生產物（稻穀、小麥和黃麻）或其加工品（紅糖）為交換。見〈制定「臺灣省政府化學肥料配銷辦法」、「臺灣省政府化學肥料配銷辦法施行細則」〉（1948-09-14）。《臺灣省政府公報》。國家圖書館藏，系統識別號：E1080841。

我們村有個小麵攤，他們中午就吃點麵、喝點酒，在村子裡待一整天，跟村子裡交交朋友，過幾天再來。

在讀小學的時候，平常沒事就是到學校去讀書；放學了以後，就是到我們村口的牛埔或是平頂山上去掌牛（zong、ngiu），當時的平頂山上還有一大片鳳梨田。我小學時成績還算不錯，雖然畢業只得到鄉民代表獎，但是初中還是考上了屏東中學。上初中以後，因為時常看小說，特別是看金庸的小說，成績就不是那麼好。那時金庸小說都是印小小的一本一本，在屏東公園有很多小說攤，我們就去一本一本租了看。我沉迷武俠小說，甚至還相約幾個朋友到大武山上去「練武」。我不是一個好學生，混了三年後還是要考高中。我父親非常擔心，看我平時也沒念什麼書，擔心我考不上屏東高中，他比我還關心，甚至還在放榜的時候去看榜，問我榜上的徐正光是不是我本人。

我最後還是進了屏東中學。屏中是一間很優秀的學校，每年總有一、兩個同學保送台大醫學院，老師也都蠻不錯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生物老師曾寶琇，那時一看就是美女，瘦瘦高高的，騎非常流線型的腳踏車上下學。另外還有一位女老師，總是穿很短的旗袍，她坐在講台桌上講課，我們這些鄉下來的男學生都一直盯著她的大腿看，那個老師就會有點開玩笑地說，「看、看、看，看什麼看、看什麼看」。還有一位外省的英文老師，在軍中以中校退伍之後才來教英文，山東腔非常地濃，我們都不知道學到的是山東話還是英文呢。總之，早期來到屏東高中的老師，多半很優秀，都來自環境很好的外省家庭。

在讀高中時，我讀的是文組的丁班。我們班上有很多調皮搗蛋但文章寫得很好的同學。屏東高中騎車到屏東市區只要一、

二十分鐘就夠了，學生常常爬出學校的圍牆，跑到屏東市看電影，或在屏東公園偷看屏東女中的女生。那時候有一部著名的電影叫「苦雨戀春風」，<sup>4</sup>有些頑皮的男生就在後面加了一句「屏女戀屏中」，這是那個時代青春少年的一個寫照。英文老師就說，「你們中有一個考上大學就不錯了！」他是很關心我們，但覺得我們大概考不上大學。大學放榜的時候，我們就去從榜單最後面開始看，看到有個同學考上世新大學就覺得好高興，想說不必再看。但看看看，又看到一個錄取東吳大學經濟系。繼續看，結果上面還有一個上了政治大學和成功大學，又還有一個人吊車尾上了台大社會系，那個就是我。這個老師其實還不錯，用激將法讓我們都可以考上大學。

## 二、負笈北上的台大歲月

之所以選社會系，是因為我考上高中後，特別對國文、英文、地理有興趣，但是數學程度不好。我買了兩本類似西洋史的故事書，叫《泰西三十軼事》<sup>5</sup>跟《泰西五十軼事》，寫的是西洋重

4 苦雨戀春風 (*Written on the Wind*) 係由道格拉斯·賽克 (Douglas Sirk) 導演，於 1956 年上映之劇情片。經查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之舊版報紙資訊，該片自 1957 年 12 月起在台上映。

5 《泰西三十軼事》 (*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為美國作家鮑爾文 (James Baldwin) 於 1905 年所作。60 年代以前的繁體中文版本係由世界書局 (1952 年)、啓明書局 (1955 年二版、1958 年再版) 翻譯並出版；《泰西五十軼事》 (*Fifty Famous Stories Retold*) 亦為同一作者所作，出版於 1896 年，60 年代以前的繁體中文版本為世界書局 (1952 年)、啓明書

要的歷史故事。我把這兩本書翻來翻去，看了六、七遍，雖然聽不懂山東英文老師的英文，但是我透過自修，把這些英文寫的西洋史看得非常熟，非常有興趣。又因為數學不好，我在填志願時想，只要未來會碰到數學的科系就絕對不填，就從台大法律系、政治系填下來，跳過經濟系，最後填到社會系。

我們上台大時剛好碰到波密拉颱風，<sup>6</sup> 因為火車中斷，我們只能換車換到台北來。我被分到台大的學生第七宿舍，<sup>7</sup> 就在蟾蜍山的山邊，周圍都是農田。如果去街上，好比非常轟動的電影《亂世佳人》上映時，<sup>8</sup> 我們這些鄉下人就會用走的走到市區。我們就從公館走到西門町去看電影，看完了又再走回來。台北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世界。迎新舞會的時候，我們這些鄉下人睜大了眼睛，呆呆地坐在那裡看台北的同學在做什麼。台北的同學就說，「徐正光，那邊的桌椅搬過來，把它排好。」反正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些鄉下人就是要做這樣的事情。他們還放起音樂跳舞，我們

---

局（1956年二版、1958年再版）出版。

- 6 波密拉颱風(Pamela)係於1961年9月12日凌晨3時以強烈颱風等級自花蓮宜蘭間登陸台灣本島，並於同日早上8時自台中新竹間離開台灣。颱風除造成近百人死亡、失蹤，一萬五千餘間房屋半毀、全倒外，頭份至新竹部分公路，以及台中至台北縱貫鐵路部分受損，截至下午2時才搶通。見徐晉淮。1961。〈第四號颱風波密拉〉。收錄於中央氣象局編，《民國五十年颱風調查報告》。台北：中央氣象局，頁29-36；〈波密拉颱風昨過境北部地區均受災害〉。《中央日報》，1961年9月13日，第3版。
- 7 台大男生第七宿舍，落成於1949至1950年前後，位於長興街（即蟾蜍山山腳）。見台大校史館。2015。《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大特展導覽手冊：06校園裡的學生宿舍》。台北：台灣大學。
- 8 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係由維克特·弗萊明(Victor Fleming)導演，於1939年上映之劇情片。經查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之舊版報紙資訊，該片自1950年2月初次在台上映，之後亦曾多次重映。

眼睛睜得大大地看，覺得世界還有這種事情。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跳舞為何物。

就讀台大期間，有幾個老師對我影響很深。例如陳紹馨、<sup>9</sup> 陳奇祿，<sup>10</sup> 他們都是我的台籍老師。1949年四六事件前後，台灣一些受過日本教育的學者雖然沒有明寫，他們教書或語言的表達也不是很好，但是從他們的文章裡，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他們在學術社群中的一些委屈跟挫折。社會系第一屆是由龍冠海當主任，一年後他被借調到東海大學，由陳紹馨代理主任。我跟陳紹馨算是蠻有關係的，從他不標準的台灣國語裡，我學到蠻多東西，至少學到一些方法。陳紹馨對台灣的民俗、諺語非常有興趣，也很有研究。我一直記得他講，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上，要從想法、看法、作法等「三法」去看，從三個方面去看一個人，看一個社會怎麼樣去變。我後來的老師王崧興先生也說，看一個社會，得保持一段距離，要用「品」的方式。所謂「品」的方法，是在去研究

9 陳紹馨(1906-1966)，台灣台北人，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早年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畢業於日本關西大學，為台灣第一位台籍社會學博士。戰前即服務於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室，創辦《民俗臺灣》、《台灣文化》等刊物，從事台灣民族學、社會學的田野採集與研究。1960年參與創辦台大社會系，並任北市文獻會及省文獻會委員。著有《臺灣之城市與工業》(與雷柏爾[Arthur F. Raper]、全漢昇合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等重要專書。見台灣風物第16卷第6期陳紹馨紀念專號各篇文章；鄭力軒。2022。《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10 陳奇祿(1923-2014)，台灣台南人，社會學家，戰前多居住於中國，1948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台任職《公論報》國際版、「台灣風土」專欄主編，1949年任台大歷史系助教，1953年自英美學成返台後晉升考古人類學系講師，1966年取得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見陳怡真。2004。《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人群關係時，既要保持密切的關係，又要保持一段觀察的距離。他認為這樣才能真正達到你要看到的東西出來。做為一個學者，就是要保持這麼一個距離去品味。我就說這個「品」字是人類學裡的一種方法論。

大學二年級開始要上初等統計學，這個經驗讓我更痛恨數學。那時系上老師不多，統計學的老師是從商學院調過來的，他選了一本最粗淺的統計學的書，在黑板上作簡單的式子也解不出來，我只上了兩次課就溜了。期末考的時候，雖可以參考上課筆記（也就是 open book），我因為上課的時間不多，也根本沒有筆記可以參考，覺得大概考不過，就把試卷折起來往抽屜裡丟，最後也就被當掉了。雖然我數學不好，但後來翻譯了一本書叫《調查分析的邏輯》。<sup>11</sup>這本書是我可以懂的，寫這本書的人很同情數學不好的人，主要觀念是覺得統計不必學太好，但是要找對方法和變數，他用了非常簡單的百分比來解答統計的問題。

### 三、伊利諾大學與保釣運動

我第一次到美國，是拿教育部第一屆社會學門的公費去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唸碩士。第一個學期我非常用功，就想著：一定要把工業社會學跟工業管理學兩門學科讀好，我那時還會跑到東方圖書館去看 30 年代魯迅或茅盾的作品。在伊利

11 見羅森伯（Morris Rosenberg）。1979[1970]。《調查分析的邏輯》〔*The Logic of Survey Analysis*〕。台北：黎明書局（徐正光、黃順二譯）。



諾期間，我曾對一件事情感到不可思議：教我們工業社會學的老師，要帶我們去看產業怎麼樣經營、工人怎麼樣工作，他竟然是坐直昇機帶我們過去。這是用非常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看美國的工業與工人，我在課堂上聽到這個消息，心裡一肚子氣，就找個藉口請假了。後來想想卻有點後悔：沒有搭直升機去瞭解美國的工廠體系，也是蠻可惜的。

沒有想到去伊利諾第一年的寒假，釣魚台運動就在東、西部大學的華人學生間快速展開了。釣運是從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開始，然後到紐約、芝加哥、伊利諾、印第安納這些大學。我們雖然不是開創運動的人，但在那個冬天也就開始投入釣運，到處去各大學串連並到領事館抗議。因為強烈的左派意識，保釣運動強烈地要求中華民國必須負起責任，把釣魚台從日本收回來，我們為此跑到各地的領事館去示威。

我剛到美國時，冬天的衣著非常不夠，伊利諾的寒風真是刺骨，去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示威抗議讓我凍得要死。記得第一次到芝加哥去的時候，教育部海外文教處的處長還派人出來，<sup>12</sup>跟我們說：「外面好冷啊，進來喝喝熱茶吧。」我們示威的時候看到穿著黑色大衣、戴著墨鏡的人就在那邊照相。只要被拍到，

---

12 當時的處長為姚舜（任期 1969 年 1 月至 1972 年 2 月）。根據外交部的檔案顯示，姚舜與曾廣順係外交人員與國民黨中委會討論後派出，負責疏導保釣運動。姚、曾兩人在 1971 年 2 至 3 月間曾多次趕赴美國各地大使館、親自參與大學內學生們召開的國是會議。然而，兩人的疏導工作並不成功，姚認為這是因為外交部和當局並未提供充分的協助。見吳任博。2011。〈再探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保釣運動：中華民國政府之視角〉。史耘，15，頁 133-174。

你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就可能回不了台灣。

那時也剛好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非常嚮往這種「打破舊傳統，追求新理想」的精神，但對文革內部並不是很了解；另一方面，美國反越戰的示威正好到了後期。我去的時候，看到這個景象想：「為什麼只有美國學生可以反越戰？」<sup>13</sup> 我們這些台灣來的學生，反而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所以找議題出來，釣魚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在這種帶有民族主義的口號帶動下，許多人都投入了釣魚台運動。

雖然伊利諾不是最早發起運動的，但我們到處去中西部的學校串聯，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釣魚台運動期間，伊利諾大學有三、四百名華人學生參與活動，時常放中共的樣板戲，還有辦叫做「社會科學研討會」的讀書會。我們都是窮學生，買的是二手車，常常在去串聯的路上開到一半，瓦斯就沒有了、哪個東西爆破了。

後來有五個台灣留學生被邀請去中國、見了周恩來，其中陳恆次、陳治利<sup>14</sup> 兩人就是我們伊利諾的同學。陳恆次後來到聯合

---

13 張秀蓉補充：「反越戰的學生很好玩，他們住過的房間會塗成非常強烈對比的顏色。我後來住的房子轉一個街區過來，就是徐老師住的 Lincoln Hall。有一天晚上，這條街不能通行了，原來是因為反越戰的學生在那邊聚集。我就住在那條街樓上，從上面看他們怎麼做。我第一次看到警察用警棍追著人打。他們把區域 block（區隔）出來，就不讓他們走，要他們聚集在這幾區反就好了。反越戰的學生就去叫、去吼。那天晚上弄得很晚。」

14 陳治利（1936-），福建福州人，東海物理系畢業後，赴美取得麻州伍斯特理工學院碩、博士，畢業後任教於德州泛美學院（即今日德州大學大河谷分校），同時攻讀伊利諾大學香檳厄巴納分校電腦科學系博士班。1971年，因吳健雄助理、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李我焱的鼓勵，

國做事，陳治利則拿了物理跟電腦的博士，到舊金山去開一間幫窮人修理電視的小店。我們這些熱心參加釣運的人，會覺得拿學位、做高薪工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出去，人家需要什麼你就幫忙什麼，「為人民服務」是最高的價值。當時我們的串聯就是到各個學校去搞國是會議，討論釣魚台的問題、國家未來怎麼樣發展的問題，或是你要站在哪一個立場的問題。我覺得我是比較左派的，因為看了很多樣板戲、小紅書跟 30 年代的作家，還有上課時遇到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學生，或是比較年輕偏左的老師。最重要的是，我從小看到台灣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對農民、工人困苦的生活一直深感同情，這也是我們投入釣運的動機。<sup>15</sup>

雖然我當時在伊利諾讀研究所，一心一意想要瞭解勞工，但每天卻很少到課堂去上課。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外面，做一些運動的事情。事實上，我在伊利諾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但是我觀察到一個社會運動怎麼樣開始、走向高峰、再走下坡的一個非常完整的過程。我覺得這樣的經驗，比讀一個社會學博士還要更有用。保釣運動是由嚮往更公平、更有尊嚴的社會的這些人發起的。到了中間，所有不論派別、不論出身的人，大家一起來做這

---

組成保釣五人團（又稱「第零團」）赴大陸參觀。見陳治利口述，歐素瑛、林正慧訪問。2016。〈陳治利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編，《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訪談錄》。台北：國史館，頁 175-192。

- 15 張秀蓉補充：「我記得我是 1971 年春天去的，那個宿舍裡面凡是台灣來的人，或是中國人，還有很多香港人都很 active（活躍）。後來各個學校送來各種不同的刊物。那時就看到《波士頓通訊》了，就是馬英九他們辦的。可見在釣魚台運動最盛的時候，不管左派右派的學生，大家通通都為這個釣魚台在付出。冷淡下來以後就開始分裂，有些就是以國是為主，有的就走到了馬英九他們那邊。」

樣的事情，很多人因為參加釣運改變了一生，他們的精神世界、對未來的嚮往已經完全不一樣。從巔峰下來的時候，你就看到許許多多參加運動的人，有了不同的動機、不同的想法，還有不同的未來的想像，各個派別在這時候已經開始分裂、摩擦了。

參加運動的有各種人，對未來自己的發展、對整個世界的想像都不同。最明顯的是分成三派，一個是左派，一個是國民黨派，或叫革新保台派（他們也自稱「中流」），還有台獨派。到了保釣後期，對立的是左派跟革新保台派，台獨派因為政治理念不同，跟釣運慢慢疏離了，另外成一派。

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件事，在我內心衝擊很大。1971年中共進入聯合國時他們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剛好就是一批台灣留學生進去了。我作為一個台灣人，覺得中共進入聯合國，讓我們當初做釣魚台運動的某些目的已經達到了；但我內心也在想：我們運動追求的，讓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目標已經達成了，但我們的故鄉，那時候的台灣，卻還是處在非常不自由、非常專制的年代，我就開始覺得應該回到台灣。

保釣運動裡最有名的就是林孝信了，<sup>16</sup>他穿著破爛的衣服、破爛的鞋子，就是為了保釣的理想。保釣的理想一方面是為了中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因為林孝信早期辦的《科學月刊》，所以

---

16 林孝信（1944-2015），台灣台北人，台大物理系畢業，後於1967年赴芝加哥大學求學。1968年創辦科學普及刊物《科學月刊》，該刊不只培植了台灣的科學教育社群，其編輯網絡也成為保釣運動的重要聯繫管道。見林孝信口述，歐素瑛、林正慧訪問。2016。〈林孝信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編，《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訪談錄》。台北：國史館，頁51-126；2019年出版《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所收錄之訪談文章。

還希望科學能夠普及化。我 1972 年要回來台灣時，曾有機會跟林孝信好好談過。林孝信自己沒有什麼生活費，到處去串聯跟領導這些釣運的工作，他的事蹟真的非常感人。林孝信那時交給我一個任務，他說：「你回到台灣，還是要繼續把《科學月刊》辦好，把這個科學的普及化做好。」但是，早期我也很少參與《科學月刊》，交給我這個任務，我也沒辦法著力。

#### 四、走入工人研究

在我回台灣開始做工人研究之前，要先從中研院的濁大計畫談起。<sup>17</sup> 70 年代，民族所從研究原住民為主，慢慢轉向漢人社會的研究，張光直<sup>18</sup> 和他所推動的濁大計畫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17 濁大計畫，全名為「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係由中研院史語所、台灣大學及耶魯大學共同辦理，國科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及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於 1972 年 6 月起正式執行。該計畫主持人為張光直、執行秘書為王崧興，透過整合考古、民族、地質、地形、動物、植物等學科，探究「濁大流域古今居民的歷史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在民族學方面，本計畫的核心目的是：「描述與分析濁水、大肚兩河流域漢人之拓展史、土著之遷徙與漢化的過程，以及各族群對於各種自然資源之利用的差異與變遷。」見王崧興。1973。〈濁大流域的民族學研究〉。民族所集刊，36，頁 1-10；張光直。1977。〈「濁大計畫」與民國六一—六三年度濁大流域考古調查〉。收錄於著者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台北：中研院民族所。頁 1-25。

18 張光直（1931-2001），台北板橋人，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就讀建中期間曾受四六事件牽連入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赴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並長期於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任教。

色。在此之前，台灣史被列為禁忌，甚至不能研究；再不然就是要把台灣史當作大陸的一部分，大多是做早期先民怎麼從大陸來的，就是從中國在台灣如何拓殖的角度來談。此外，早期研究原住民時，是把他們當作中國的邊疆民族來研究，這是因為有些做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的學者來台，他們無法繼續做研究，只能從原住民的文化、傳統和神話，試著去瞭解古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濁大計畫就是在做濁水溪、大肚溪流域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發展，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的相關研究。它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過去非常不一樣，屬於人地關係的綜合性研究，研究團隊包含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和生物學，這是希望從不同的觀點來看濁水溪、大肚溪這一塊地方，台灣史的研究就因此開始轉向了。當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還沒有成立，但是《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的刊物已經出版了，推動著台灣史的研究。<sup>19</sup> 台灣史研究的轉向與後來行為科學的研究，幾乎都是在70到80年代間出現，後來一些重要的台灣史、社會學或人類學者，幾乎都是在這個階段培養出來的。這個計畫最重要的就是開啓了後來的研究方向與研究主題。

我自己為什麼走入工人研究，也與這個學術轉向有關。台灣

---

1994年受李遠哲之邀出任中研院副院長，著有《古代中國考古》等書。見張光直。1998。《蕃薯人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

19 該刊首期出版於1986年12月，係「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工作室的聯繫刊物。該項計畫源於張光直1985年向中研院提出的構想，並於1986年正式向國科會提出補助申請，由史語所、民族所、近史所與三民所等四所共同合作辦理。該案亦因濁大計劃等「在台灣研究上共同合作的實際經驗」而得以成立。見著者不明。1986。〈研究計劃〉。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頁2-3。

在 70 年代開始工業化，農村在沒落，很多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裡，中研院民族所也開始推動行為科學的綜合研究計畫。以民族所為主，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三個主要學科，後續再加入政治大學的企業管理研究所。在這項計畫之下，有些老師輩的人類學學者就到彰化伸港鄉去做研究，王崧興老師則是去到龜山島做漢人漁村的研究。<sup>20</sup> 所以，人類學家也逐漸走向漢人社會的研究。

李亦園所長卸任以後，是由文崇一教授擔任所長，<sup>21</sup> 他推動了都市化和社區變遷的研究計畫。文崇一先生希望這個計畫也是綜合性的研究，計畫參與者包括了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一同探討都市與社區生活的改變。那時候找了萬華地區、大溪地區、關渡地區、龜山地區這四個地區，<sup>22</sup> 看看整個都市化的過程裡面對民間、庶民社會發生怎麼樣的影響。到了要做龜山工業區的計畫時，我剛好從國外回來，只有參與最後一部分龜山的計畫。

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看到龜山工業區怎麼跟鄰近的農村社會互動，又產生怎麼樣的變化。我們那時候住在龜山工業區旁邊的村舍，發表文章時，我們稱之為岩村，其實它的本名叫做山頂村。<sup>23</sup> 我在參加山頂村研究的時候，工業區的運作才開始

- 
- 20 見王崧興。1967。《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21 李亦園先生任該所所長期間為 1970 年 11 月至 1976 年 10 月，文崇一先生則為 1976 年 11 月至 1982 年 10 月。
- 22 此計畫成果中的萬華社區、龜山社區部分，發表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9 期、第 42 期。
- 23 即今日桃園市龜山區山頂里。

不久，在農村跟工業區之間形成了一條線。除了三鶯路之外，工業區被高高的圍牆圍了起來，農村在外面，就像兩個世界。我們常常在下班時看到三鶯路上有很多工人進進出出，我就想，希望哪天能夠翻過這道圍牆，到裡面去看看這些工廠怎麼樣運作，裡面的工人又是怎麼樣生活。我們在山頂村做了一年的田野研究，住在一個耆老家裡大概三到五個月，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訪問他們過去的歷史，我的研究則著重在岩村的生態與經濟的變化。<sup>24</sup>

做了龜山工業區山頂村的計畫後，我、文崇一跟許士軍就想要進到工業區去。我們一直在談：既然工業化進展地這麼快速，是不是也要來研究青年工人的生活？因為這樣，張曉春才加入了這個計畫。<sup>25</sup> 也就是說，都市化跟農村的社區研究完成之後，下一個階段，我們要做的就是青年工人的行為與生活。我跟他們建議說，讓我一個人先去工廠裡做半年田野調查。我去的工廠是做化學纖維的，化名叫做寶尼工廠，在那時候是賺錢賺得最多、最有名的一間工廠，生產的尼龍纖維原料主要提供給下游的紡織廠。我進去的時候剛好是工廠發展到高峰再下來的時候，所以剛好也看到它怎麼樣上去，又怎麼樣下來。當時的廠長對我們蠻好

24 見徐正光。1976。〈岩村的生態與經濟變遷——一個農村的工業化與社區生活研究之一〉。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2，頁 1-39。

25 張曉春(1932-1996)，福建廈門人，就讀師大附中時曾捲入白色恐怖，出獄後考入台大社會系第一屆，1964年後長期服務於台大社會系至退休。早年從事台北市都會區發展研究，後轉入勞工研究，並積極投入解嚴前後的勞工運動，與各地工會幹部來往，被尊為「台灣勞工之父」。多發表關懷勞工、基層民眾之政論如〈勞工人權宣言〉、〈勞心勞力都是勞動〉，後輯錄為《勞心勞力集》。見張曉春先生治喪委員會。1996。〈張教授曉春先生事略〉。海峽評論，70，頁 89-90。



的，他覺得我們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就安排我們住在工廠裡的宿舍。他們在工作時，我們也可以很自由地去看他們怎麼工作。我們那時還找了一、二十位工廠工人幫我們寫每天的日記，可惜沒有全部完成。

我認為看工廠要從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來看：它的原料是怎麼來的？它的工人是怎麼來的？它的管理人員是怎麼來的？1976年的石油危機對這間工廠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為發展化學纖維這方面的產品，非常依賴外來的石油；又因為台灣股票市場開始發展，工廠的管理人員也有點放鬆，他們關心的不是企業的業績，反而更關心股價怎麼上下波動，一下子不知道怎麼應付外來的衝擊。我們一方面看到工廠的工人是怎麼樣在工作、生活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大的企業組織是怎麼樣跟環境、外界在互動，組織怎麼樣調整。

我們當時在討論一個大型的計畫，寶尼工廠的研究只是 pilot study（前期研究），這個研究結束後，我就正式開始和許士軍、張曉春、文崇一一起做。<sup>26</sup> 我們那時挑了四種企業，分別是汽車製造廠、電線電纜廠、紡織廠跟塑膠工廠，每一間工廠都有實地參訪，也跟工廠老闆做一些討論。我們主要是看不同類型工廠的工人，用問卷調查來做研究。總而言之，那個階段我做的工廠工人的研究，是爲了瞭解自己生活的這個社會，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對象去研究。

---

26 見許士軍、文崇一、張曉春、徐正光。1975。〈青年工人的職業生活與個人行爲——社會變遷中的調適問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徐正光。1980。《工人與工作態度：臺灣工廠人的實證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五、在中研院與清華大學服務<sup>27</sup>

80年代初期，中研院裡有一些年輕的知識份子，他們雖然是外省人，但是對國民黨統治也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自己繼承胡適的自由主義傳統，希望能在學界裡面建立自由的學風。在當時壓抑的情況下，他們辦雜誌、發表演講，澄社也是在這時候組織的。那時候最早辦的是《思與言》雜誌，我也當過這本雜誌的執行編輯，他們就是以這本雜誌作為發聲管道，標題的意思就是你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你怎麼想，就把它寫出來，也當作是一種干預社會的方式。聯合報系還有一本雜誌叫《中國論壇》，<sup>28</sup>像是袁頌西、張忠棟、胡佛、李鴻禧都在裡面。學術界裡面中、青年輩的學者，開始形成一個無形的力量，最開始以《思與言》為據點，後來到《中國論壇》，還曾經被王昇控告，說是費正清拿錢去幫助他們。

清大原本一直都是理工科的學校，沈君山在當校長時，<sup>29</sup>跟

27 本段內容亦可參考徐正光。2017。〈回憶和李先生學習的日子〉。收錄於中研院民族所編，《李亦園先生紀念冊》。台北：編者自印，頁61-67。

28 中國論壇於1975年10月由聯合報創刊，1992年10月停刊，共刊行385期。發行原因一部分是受到黃信介等人發行《台灣政論》激勵，認為台灣存在發表政論的新空間；另一部分則是聯合報有意聚集一群筆陣與學者，強化報界與知識界的聯繫。見中國論壇第33卷第1期停刊號各篇文章，以及羅元德。2004。《〈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台灣自由民主之路（1975-1990）》。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之碩士學位論文）。

29 沈君山（1932-2018），浙江餘姚人，台大物理系畢業後，於1961年取得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學位。1973年返台於清大物理系任教，後出任清大理學院院長（1973-1987）、清大校長（1994-1997）。見沈君山。2012。《此生泛若不繫舟》。台北：天下文化。

前面這些學者都是好朋友，他就邀請這一批學者去開通識課程。後來兩、三年間，這些學者都到了清華去，教通識教育、發表演講，醞釀清華的社會人文氣氛。他們很希望清大變成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希望能夠成立法學院、文學院，甚至醫學院。1985年，我當時被台大社會系合聘，只做了一年。

後來清大要成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李亦園教授又已經在那邊擔任人文社會學院的院長，他就把我從台大社會系合聘到清華去，那是1986年。我去籌備了一年，1987年社人所就成立了。社人所是李亦園老師的設計，李先生當時很希望把民族所推廣的行爲科學綜合研究推廣到台大以外的大學，他跟沈君山又是Buddy Buddy（十分要好）的朋友，所以先在清大成立社人所，後來慈濟大學、中正大學設立類似院系時，也都定名爲「人文社會學院」。

我們招生的時候，也不曉得這些來考的學生是從哪裡聽到這個消息，報名的超過一百二十人。清華大學自己的研究所或是其他學校人文社會學類的研究所，從來沒有這麼多學生來報名。那時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非常普遍，這些報名的學生都是在外非常活躍、衝撞體制的一批人，他們都來清華報名。清華大學前三屆是最優秀的學生，他們一方面有街頭的經驗，另一方面又想好好地讀書。

很妙的是，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嚴，清華大學社人所又在這時成立。碰到這麼大的歷史變遷，這樣一個新的研究所，能做什麼呢？我們當時就討論要辦一個研討會，才有所謂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過了兩年，我們又辦了「台灣的國家與社會」研討會，看台灣整個國家的體制是怎麼樣跟社會互

動，怎麼樣壓制台灣的社會發展。<sup>30</sup> 這些研討會中，前面提到的學界大將，都來當我們的主持人或發表人。李亦園算是這個群體中很重要的一位，他把民族所的學術潛力帶到清華去了。

那時的民族學研究所是社會運動的重鎮，被外界戲稱為「民主進步所」。我們有許木柱、柯志明、吳乃德、謝國雄、張茂桂這些民族所傑出的年輕老師，而且當時清華跟中研院之間有三班交通車，交通也很方便。成立社人所在清華是一件大事，很多清華理工科的教授也開始埋怨地說，以前我們非常安靜地在研究室裡面做研究，現在清大怎麼像外面社會一樣，吵吵鬧鬧的。像是有位知名的電腦教授，他常在學生的大學報批評學生的行動，不料卻被學生反批，「老爹你又來了」，這幾個字在清華的學生中，一直流傳到現在。

## 六、五二〇事件、獨台會案與刑法一百條

爲什麼吵吵鬧鬧？因爲那時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說野百合運動，我們參與的學生很多，他們去火車站過夜抗議，或是就坐在「中正廟」裡面。1988年的台灣農民運動，剛好是5月多，正是社人所第二屆招生的時候。我們在清華大學裡面，研究所考試考完，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發動了七百多人的學界連署，抗議農民被鎮暴警察施暴，這個連署第二天就在自立晚報的頭版頭條

---

30 這兩場研討會宣讀的論文後來集結成冊，請參閱徐正光、宋文里編。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出版；徐正光、蕭新煌編。1996。《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巨流出版。

登了出來。

登出連署是很轟動的事情，這是第一次這麼大的學界連署，後來我們這幾個帶頭的，就常常接到匿名信，也常常接到匿名電話，像是有封信就寫說：「徐某某，你小心一點，你再這樣搞下去，第二天你的家人就看不見太陽了。」也有一個新黨的立委曾威脅說，要到中研院來和我辯論。

那時我們所上有一位同事叫許木柱，是我以前在民族所當所長時的副所長，他跟黃美英<sup>31</sup>當天聽到警察說「農民要從雲林地區搬石頭、棍棒來丟警察」。黃美英研究的是台灣宗教，很優秀、很有才氣，也是社運中著名的女將。黃美英、許木柱他們就去找這些石頭，然後到雲林去找石頭來比較。他們兩個後來寫了一本小書叫「石頭記」，就是去把警察聲稱農民帶的武器，像是竹竿、石頭都拿去比對，再去月涵堂開記者會給大家看。1988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是客家母語運動，那時我是客家雜誌社的社長，這個運動集結了客家鄉親及各類社運人士，抗議國民黨的母語及本土文化政策。

1989年，發生了清華宿舍裡放A片的事件，整個校園裡沸沸揚揚，很多教授跟學生都批判，學校也要對放A片的學生加

---

31 黃美英(1953-)，新北新店人，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先從事民生報副刊編務，1983年後至中研院民族所任研究員劉斌雄研究助理，協助執行中國人權協會委託之台灣土著人權調查計畫。五二零事件前後，與劉斌雄起草聲明，並透過中研院助理聯誼會廣邀學界聯署，後於1988年5月23日發表於自立晚報；另並協助起草《五二零事件調查報告書》，應是徐正光先生所稱之「石頭記」。見黃美英口述，徐文路訪問。2019。〈黃美英女士訪問紀錄〉。收錄於徐文路編，《1987-88台灣農民運動口述歷史計畫結案報告》。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頁2.84-2.92。

以嚴厲懲處。因為社會運動已經搞得學校裡面吵吵鬧鬧，宿舍裡面居然還放 A 片，學校就爲了這件事情開全校的行政會議，參加的行政主管都覺得這件事情茲事體大，吵了老半天。我那時候是所長，前面不講話，後面才說：「這件事情當然很嚴重，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在座很多都是出身德國、美國、英國的著名大學，你們想想看，你們過去曾經就讀的大學，是不是都發生過這種事情？這些著名的大學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在學術之外，對於學生的創意和言論自由的寬容。」前面一直批判的人就沒講話了。後來校務會議就說，那總要做一個懲戒吧，最後只做口頭申誠，這事情就過去了。

另一件事情就是 90 年代的獨台會案。此一事件是有歷史研究的學生組織讀書會，閱讀及討論史明的名著《台灣四百年史》，警察因此進入校園來抓學生。此事引起學術界公憤，有陳師孟、瞿海源等五個教授，<sup>32</sup> 在中正紀念堂坐鎮抗議這個事情。清大人文社會學院的老師聽到這件事，就包了遊覽車到台北，要去中正紀念堂聲援他們。到那邊已經晚上 7、8 點，現場已經被圍起來進不去了，所以我們就在外面抗議。第一個是抗議學生被抓的事情，怎麼可以因爲學生組織讀書會，情治人員就到學校抓人？

---

32 張秀蓉補充：「發生事情那天是母親節，我早上送徐正光去改考卷，到了傍晚時，顧忠華打電話來問（那時他是社會學會的總幹事）：『徐老師在不在？』我說：『不在啊。』他說：『喔！那他是不是被抓走了？』我說：『爲什麼會被抓走？』他說：『因爲獨台會的事情。』我說：『沒有抓走啊！我早上送他去改考卷，真有這回事？』他說：『真的。』然後我說：『有哪些人？』他說：『瞿海源、蕭新煌啊。』不過蕭新煌那時應該不在，他好像坐鎮在中研院，說要擬稿子去保他們，把他們弄回來。」

我們一直在那邊抗議，到了晚上 11 點時，據守在裡面的警察就開始大聲廣播：「你們這些外面無所事事的人、不相干的人，請你們快點出去，否則的話，鎮暴警察馬上就會衝出來，見人就打。」我們當然不會走，但是真到 11 點的時候，那些鎮暴警察就衝出來，很多同事、同學都往台大醫院疏散。我在清華人社院的同事于治中被一衝，就摔倒在地上。我看到他跌在地上，就沒有跑。鎮暴警察還說：「欸，幹嘛不跑，還慢慢走。」我跟警察說：「你沒有看到他行動不便嗎？」警察說：「什麼行動不便，走走走走走！」

獨台會的事情，第二天在校園裡面就發生抗議運動。我們聚集在清華大學行政大樓前面抗議，要求校長出來說明這件事情。劉兆玄校長那時在台北開會，聽到這個消息就趕回來清大。學生指著他罵：「學校的校園，怎麼情治單位的人可以到學校裡面來抓學生？」劉兆玄說：「我不知道這個學生，也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後來吵了好久，劉兆玄說會發布一個聲明。<sup>33</sup>

到了 10 月份，我非常低調地參與了刑法一百條的抗爭。那時有一個牧師，很贊同林義雄的非暴力抗爭，我們在土城萬佛寺參加了由一位牧師主辦所謂「非抗議運動」的練習，比如說警察來的時候你應該怎麼樣對付，警察要把你拉開的時候，怎麼樣大家把手互相牽起來，讓他拉不動，還說不要去激怒警察，怎麼樣把警察當朋友，大家一起坐下來抗議。像這類的活動，在那邊

33 張秀蓉補充：「抗議的第二天，清華這批人又趕到警總，通通跑到那邊去坐鎮。後來又跑去軍法處，因為這個案子算是叛亂案。我那時在台大教書，我就說我們也罷課好了。後來要求放人的時候，是劉兆玄帶著清華這些人去要求放人。」

訓練了三個晚上，結束受訓後當天下午我們就回到中正廟，那是10月9號晚上，很多民衆就包圍在中正廟旁，他們跟我們一個個握手，那個握手的熱情感覺，我終身都難忘。

## 七、對工運友人的回憶

80年代台灣的農運和工運在開始的時候，也受到左派的影響，例如張曉春。張曉春是廈門出生的，中學時他讀師大附中，後來讀台大社會系的第一屆。<sup>34</sup>我們會認識是因為看到彼此在《中國時報》、《工商時報》和《中國論壇》上的文章，後來澄社成立，我跟曉春很合得來。他年紀比我大五、六歲，讀中學時可能受到校園左派運動的影響。

張曉春是台灣工運界的奇葩，他在台大教書，但他可以奔波到台灣各地，哪裡有需要，他就去參加。他只要一見到哪裡有工運，可能連書都不教了，或是請假就跑去了。他把工人當兄弟，經常勾肩搭背喝酒，四處廣結善緣。只是大陸開放探親以後，他常常跑到大陸去，之後我就比較少跟他接觸。參與勞工運動的時候，張曉春是我的榜樣，因為他做得到的事情，我常常做不到。我覺得我是一個學術界的人，但曉春不只是教書，他還是個「社會運動人」。

比起曉春，我的工運參與其實沒有太深。我自己想，我大概

---

34 張曉春為1964年畢業，徐正光為1965年畢業。見國立台灣大學五十二學年度畢業同學紀念冊，頁104；國立台灣大學五十三學年度畢業同學紀念冊，頁106-107。



是一個「人型立牌」吧（亦即去現場給予精神支持的意思）。那時去聲援勞工運動，我常常坐著藍博洲的舊車去。像是遠東化纖，或是桃園客運的罷工，我只是站在旁邊，但是工會幹部會大聲點名「清華大學的徐正光所長在這裡」。遠東化纖那一次，新埔那裡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在場的勞工領袖都是客家人，這顯示勞工運動其實有很多客家人。我去的時候他們很高興，就說某某所的所長徐某某在我們人群中，他們就士氣大振。<sup>35</sup>我覺得我能夠做的，就是在精神上支援他們，同時在學術界寫一些有關勞工的事情。其實，包含農運、獨台會案，都是發生在我在清華當所長的時候，所以我們所成立第二年，就出了《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這本書集結了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的討論。

會認識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sup>36</sup>是因為跟政大企管所合作執行計畫，所以我會到企管所的圖書館借書，那時圖書館的管理員正好是陳菊，陳菊跟艾琳達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艾琳達曾到民族所來做一年的訪問研究，後來她要跟施明德結婚，也邀請我去參加。楊青矗發表一系列的工廠小說，由艾琳達翻譯，後來英文版發表時，我跟柏克萊大學的博士候選人高隸民（Thomas

35 張秀蓉補充：「有次一大早，他跟我講說，我要馬上趕到新竹去，說清華大學那邊有會要開。到清大不久，我開車到一半，就聽到他們說，清大社人所的所長徐正光教授來了，他等於是站在工人跟資本家中間，是一個緩衝的人物。我就說：『又出去了！我才把你送走！』我是開車時在收音機裡聽到的，我自己也嚇一跳。」

36 艾琳達曾於1975、1977年兩度來台從事女工研究，後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遭驅逐出境。見艾琳達口述、林佳瑩著。《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台北：遠景出版。

Gold) 都有去參加。<sup>37</sup> 後來艾琳達參加民進黨的活動比較多，我們就比較少接觸，只偶爾在聚會時碰面。

雖然跟 Linda 不是那麼常見面，但就覺得這個女孩子真的有一種非常愛護台灣的感覺。我不像艾琳達，並沒有參與民進黨，我們雖然覺得參加社會運動是學界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但是要參加一個黨的活動，離學術活動還是有點距離。我們開會的時候，雖然會跟勞工陣線的人碰面，但跟他們沒有那麼密切的接觸，反而是跟《人間》雜誌、《夏潮》雜誌這批人見面的時間比較多。

我已經忘了怎麼會認識楊青矗，但在 70 年代，那時不斷出現所謂的鄉土小說，楊青矗、王禎和、黃春明這些人的書，我們都看了。那時多半是在黨外雜誌上看到的。提到黨外雜誌，我還記得在左營當少尉行政官時，放假常常到台北去時買當期的黨外雜誌。有一次到一個攤位，我說：「有沒有某某雜誌？」，老闆說：「沒有沒有沒有。」那沒有我就走到另外一個攤子去，後來我覺得不太對勁，我明明知道他常常賣這份雜誌，怎麼會沒有呢？後來過了幾個攤位我又回去，問那個老闆，我說：「老闆，我以前常常在你這個攤位買雜誌，為什麼你今天不賣我？」那些都是黨外出版的雜誌，他說：「昨天就是像你這樣，留著平頭、穿著黑長褲白襯衫的人，真是的！我的那些書都全部被收走了，所以我一看到你就不賣給你。」他把我當成那些情治人員了。

我想我基本的人生關懷有三個。第一個，就是關懷弱勢團

---

37 見楊青矗。1983。《楊青矗小說選 Selected stories of Yang ch'ing-Ch'u》。高雄：第一出版(Thomas Gold 譯)。

體；第二個，關心台灣的未來；第三個，希望可以用學術的角度做一些事情，比如說勞工、農民運動。我寫過國民黨的侍從體系，或是國外的學者怎麼樣談工人跟工廠的疏離感、異化等這一類的問題，給蘇慶黎的印象很深，<sup>38</sup> 她曾對我說：「沒有想到你還可以用學術界的眼光看這些事。」對於這些弱勢團體的活動，我雖然沒有很深的介入，但是一直在關懷，希望在學界的人，也能為弱勢族群付出一些心力。

---

38 蘇慶黎（1946-2004），台灣台北人，台大哲學系畢業後在陳鼓應介紹下參與《夏潮》雜誌等黨外刊物的編輯業務，曾因美麗島事件一度被捕。80年代初期共同發起黨外編聯會、勞工法律支援會，並參與工黨、勞動黨的創立。見夏潮聯合會。2004。〈蘇慶黎女士生平〉。夏潮聯合會（[url=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652.htm](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652.htm)），檢閱日期：2020年5月9日；《人間思想》第25期「台灣戰後自主工運口述系列（一）：蘇慶黎——黨外、《夏潮》、左翼」專號各篇文章。